

中國地理學史

陳正祥著

商務印書館

中國本國史

中國地理圖史

陳正祥著

中國地圖學史

陳正祥著

出版者	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香港皇后大道中三十五號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香港印刷廠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 版權所有 *

1979年 3月初版

序 言

中國地圖學或製圖學的發展，遠早於歐西國家。長沙馬王堆漢墓發現的古地圖，提供了實物證據。從西晉初年裴秀的創作製圖六體，經唐代賈耽和元代朱思本等人的發揚光大，到明代羅洪先的改編《廣輿圖》，傳統上都採用“計里畫方”的圖法，或稱方格圖法。中國此一傳統的製圖法，在十三、十四世紀之交傳播到西方，影響了阿拉伯製圖的方法和技術。隨後十四五世紀歐洲地圖學的發展，不僅得力於阿拉伯人對托勒密（Ptolemy）圖法的實踐改進，而且也通過阿拉伯人的媒介，吸取了中國“計里畫方”圖法的精華。

不幸在罪惡滔天的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曾有百多年的黑暗時期，使得中華民族所創造的光輝文化，受到了歧視乃至完全抹殺！目下流行的所謂“製圖學”著作，事實上只能算是歐洲人的製圖學，根本不提中國古代的先進製圖學和偉大的製圖學家。

一九六四年七月，國際地理學會在倫敦舉行第

二十屆大會後，八月初又在愛丁堡和國際地圖學會（International Cartographic Association）聯合舉辦了研討會（Symposium）；各國學者所提出的論文共計一百一十九篇，其中除《利瑪竇對遠東地圖學的影響》一文外，再沒有任何東西關連中國的了。我當時因受委託主持東亞和東南亞土地利用圖的編製，曾和意大利的 Vanzetti 教授代表世界農業地圖集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World Atlas of Agriculture）參加愛丁堡研討會，和各國地圖學家有所接洽，發覺此等著名人物，包括長期把持國際地理學會和地圖學會的巨頭，對於中國古代非常進步的地圖學，幾乎一無所知。記得有人問起中國古代城市有無明細地圖？我告訴他們除了長安、洛陽等古都很早就測繪地圖外，在清代初年，中國還測繪了六百五十分之一的明細北京圖，把每一幢建築物都畫到了圖上，無疑是當時全世界最佳的大縮尺都市圖，但聽者始終將信將疑。當我再說明非但親眼見過這龐大圖冊，而且還保有縮小的照片時，忽然有人提醒我說：你們中國在清代初年所完成的一切較佳地圖，都是由歐洲傳教士幫助測繪的！這正是舊世界頑固學者對舊中國的傳統態度！

經過這次的教訓和刺激，我覺得自己有責任要

作一些彌補的工作。事實上，早些時就有不少國際朋友對我說過，歐美學人對中國古代優美的文化知道得很少；他們不識中文，也沒有機會看到這些地圖，我應該提要把它們介紹出來。所以我回來之後，決定把多年收集得到的資料加以整理，在一九六八年於印度舉行的第二十一屆國際地理學會，提出了一篇叫作“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artography”的論文。其後繼續收集資料，不斷加以擴充，發給研究院學生作為講義。當我知道長沙馬王堆出土了古地圖，一直很高興。其中第一幅地形圖和第二幅駐軍圖經修理發表後，我幾乎是立刻執筆，加工完成了此項研究。

本書的書名，承友好書法和金石大家陳秉昌先生題字，謹此致謝。

一九七七年十月於香港中文大學

目 錄

序 言	1
一、漢墓出土的彩色地圖	1
二、古籍中關於地圖的記載	5
三、裴秀與製圖六體	10
四、賈耽及其《海內華夷圖》	14
五、宋代的地圖	20
六、《輿地圖》和《廣輿圖》	30
七、清初的測繪事業和皇輿全圖	38
八、外國人對中國邊區的測繪	46
九、清末和民國的測繪事業	51
十、測繪總局和地圖出版社	59
十一、數明產業地理研究所的貢獻	66

參考文獻	70
------------	----

插 圖

1. 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地圖
2. 《禹跡圖》

3. 《華夷圖》
4. 南宋《平江圖》
5. 南宋《輿地圖》
6. 明嘉靖四十年（1561）浙江初刻本《廣輿圖》浙江幅
7. 明萬曆七年（1579）山東重刻本《廣輿圖》遼東幅
8. 明萬曆《順天府志》北京城圖
9. 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部分）
10. 《康熙內府輿圖》山東、遼東半島幅
11. 清初測繪長城圖
12. 乾隆京城全圖（部分）
13. 大運河圖，長江和淮河間部分
14. 海英查勘西南邊界及帕米爾全境形勢道里圖
15. 欽差大臣沙克都林札布會同俄使裴克托爾米德恩斯克 依勒分喀什噶爾屬邊界圖
16. 英楊哈思班游帕米爾圖
17. 光緒十四年（1888）上海城廂內外租界全圖
18. 山城重慶市街圖（部分，1886年）
19. 海塘新圖—錢塘江口海圖
20. 杭州與西湖圖（1913年）

一、漢墓出土的彩色地圖

一九七三年冬天到一九七四年春天，中國文物考古工作者對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進行了發掘，獲得帛書、竹簡、帛畫、地圖、兵器和絲織品等一千多件珍貴文物。其中三號墓出土的三幅繪在帛上的地圖——地形圖、駐軍圖和城邑圖，給中國地圖學史提供了最早的實物資料，放出了新的光彩。①現在地形圖和駐軍圖已經整理修復，有關的論著也相繼出現。茲先將該二圖略加介紹，作為本書的引論。

地形圖長寬各九十六厘米，作正方形，圖向朝

① 地圖是夾在其他帛書中疊放在一個長方形漆盒的格子內，用很薄的帛繪畫，經過長期疊壓，邊緣殘破，已經斷裂為三十二片；其中五片破損較重。古圖出土時好像一堆豆腐渣，經故宮博物院修復廠修裱工人的精心處理；先一層層揭開，再把碎片一一黏連，裱糊成三十二張帛片；每張帛片長二十四厘米，寬十二厘米，然後合併成一整幅。

南；亦即上南下北，②圖上沒有名稱、圖例、縮尺、繪製年代或任何說明，內容包括山脈、河流、聚落和道路；相當於現代的一般地形圖，或許也就是漢代所謂輿地圖。所繪的地區大致包括東經111度到112度30分，北緯23度到26度之間；地跨湖南、廣東和廣西的一部分，約略相當於今日廣西壯族自治區全州、灌陽一綫以東、湖南省嘉禾與廣東省連縣一綫以西；北到新田、全州，南到珠江口外的南海。地圖的主區為西漢初年長沙國的南部，亦即今日湘江上游最大支流瀟水流域和南嶺、九疑山一帶；繪畫比較詳細準確，比例約為18萬分之一，或相當於一寸折合十里的地圖。③其南為當時割據的南粵王趙佗轄地，繪畫比較粗略，比例失真，海岸線平直。

圖上所繪的聚落或居民點共有八十多個，分為兩級：縣城級的八個——營浦、南平、舂陵、觀陽、

② 地圖的朝向，有人認為古代的地圖朝南，近代的地圖朝北，這是不正確的。大致全國性的地圖皆朝北，局部性的地圖，因其繪製目的不同，朝向有異。這幅圖是邊區圖，要防南粵，故朝南。我在羅馬教廷圖書館所發現的長達五米、清康熙時測繪的長城圖，也是朝南的。明末浙江福建沿海圖則朝東。將來如能在西北地區出現一幅漢代局部地圖，說不定會是朝北甚至朝西的。

乾道、桃陽（《漢書·地理志》作洮陽，故城在今全州縣城西北17公里）、冷道和桂陽（桂陽故城即今廣東連縣的縣城）；鄉里級可辨識的有七十四個。縣城用矩形表示，鄉里用圓圈表示，符號大小不等，地名一律記註在符號之內，所用字體介乎篆書和隸書之間。這表示地圖所使用的符號，已作到了統一的設計。大部分縣城和一些主要鄉里中間，都有道路連繫。道路用粗細均勻的實綫表示，個別用虛綫表示，可以判讀出來的共有二十多條。

南部地區（地圖的上部）已超出長沙國的封疆範圍，屬於敵對的南粵王轄境。大概因為情況不熟悉，故在這一部分不畫鄉里，也不畫縣城。這又表示了此圖的繪製有一定原則。在廣大的南部地區，只註上“封中”一個地名，可能是指當時南粵的封陽地區。

③ 此項比例是一個平均的概數，利用古今地圖上能夠大致確定位置的五個同名點，然後分別在復原圖和現代五十萬分一地形圖對比測算，可知復原圖主區的比例介乎17.2萬分之一到19萬分之一，平均約為18萬分之一。又按當時的度量制，一里折合300步，或折合1,800尺，或折合18,000寸，故相當於一寸折合十里，也是一個合理的整數比例。

地形圖上所繪的河流，大小共有三十多條，其中九條註記了名稱：營水、春水、冷水、羅水、壘水、牯水、臨水、深水等（有一條專名部的字跡無法辨識）；其中冷水和深水兩條河流還標明了水源所在。從上源到下游，表示河流的綫條逐漸由細變粗。例如圖中最大的一條河流，源流段綫條粗度為0.1厘米，到營浦以下加粗到了0.8厘米，而且繪法熟練。試將此圖的水系和現代地形圖比較，可以看出河流的分佈、流向和曲折情形大致符合，主支關係表示明確，河山之間處理得當，彎曲自然，交匯點的繪法合理。河流的名稱註記在匯歸主流的河口處，足見此圖的繪製技術已頗高明而有條理。

山脈的繪法，則別具一格。南嶺地區山脈縱橫交錯，山嶺盤結成簇。該圖採用閉合的山形綫，表示出山脈的坐落，山體的輪廓及其延伸方向。例如觀陽、桃陽以東的都龐嶺，就繪畫得清晰醒目，並且走向也大致準確。南嶺之作為長江和珠江二大水系的分水嶺，在圖上也表示得很清楚。在表示山形的閉合曲綫之內，再加上暈綫，或橫或豎。所有山脈皆未註其名，可能因為當時開拓未久，山名不似河名肯定。但在九疑山所在的位置，分別記有“帝舜”和“深水原”五字。九疑山是傳說帝舜死後的

葬處，建有廟和石碑，為當時名山，故繪畫特別明細。這裏的山形曲綫安排成魚鱗狀，表示了峯巒起伏；又添了九條高低不等的柱狀符號，大概是代表九座主要山峯。按《九疑山志》有“九峯相似”、“行者疑惑”因而得名的記載，可見這九條柱狀符號也是有文獻根據的。

綜觀全圖，可以看出內容相當豐富，而且對於內容項目的選擇與處理，也有一定的原則。地圖符號的設計，已知分類分級。這充分說明我國在兩千多年前，地圖的測繪技術已達到頗高水平。如果把這幅地形圖照樣重繪，而刪除古體字的地名，則即使對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地理學家，也可能誤認為是一幅現代的、為某項特殊目的而擬的草圖，絕難想到是漢墓出土的古地圖。

駐軍圖出土時已斷裂為二十八片，原用兩幅帛上下拼接而成；長九十八厘米，寬七十八厘米，用黑、紅、田青三色繪製。其中有關軍事的部分，一律使用硃紅色。圖幅的左上方分別標明“東”、“南”兩個方位。主區為深水流域，在今湖南省江華瑶族自治縣的瀟水流域，方圓約達五百里。主區的北部繪得比較詳細，南部地帶比較簡略。主區的縮尺約為八萬分一到十萬分一。圖中所註文字方向不同，

便於從四面觀看。圖上除了山脈、河川等外，主要表示出九支駐軍的佈防以及防區的界綫和指揮中心的城堡等。

駐軍圖用黑色單綫標繪山脈的走向，並且至少註寫了九個山頭的名稱，包括留山、昭山、蛇山等。河流概用田青色繪畫，大小總計有二十條；其中十四條在其上源註寫河名，如大深水、資水、如水、湛水、袍水、矛水、智水、條水、延水、菑水等。九支軍隊的駐地（周都尉軍兩支、徐都尉軍四支、司馬得軍兩支、桂陽□□軍一支），則用紅、黑色雙綫勾框表示；框內標註各軍的名稱，多數分佈在河谷地帶的制高點上。各軍駐防區的界綫，用硃紅色標繪（有數處紅色已變黑）。圖中留封、昭封、居向封等封，就是邊塞的烽燧點，相當於現代戰爭的前綫監視哨。

在這幅駐軍圖的中央，繪有三角形的城堡，內註“箭道”字樣，是各支駐軍的指揮連絡中心。城堡建在大深水河谷幾條支流的匯合點上，三面環水，一面靠山，築有城垣、戰樓和瞭望樓等，位置的選擇也頗有意義。

根據同墓出土的一條木牘，記載有“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辰”字樣，可以斷定該墓的下葬年代為

西漢文帝初元十二年，亦即公元前一六八年；而這三幅地圖繪製的年代，又必然在下葬以前數年或十數年。^④故這三幅地圖，圖齡應在二千一百五十年左右，不僅是中國已知的最早地圖，也是全世界已經發現的最老最好地圖，值得大書特書的。^⑤中國古籍中有關地圖的記載，雖可上推到三千多年前西周初期經營洛邑時所卜繪的地圖（詳見第二節），但宋代以前的所有一切地圖，早已全部失傳！地圖一則因為篇幅大，保存不易；二則因其摹繪工作遠比文字傳抄困難，故地圖的流傳存世遂遠較書籍為

④ 據歷史文獻記載，在馬王堆三號漢墓下葬前十多年，割據嶺南的南粵王趙佗，自稱皇帝，反叛中央，進擾長沙國的南部，漢王朝曾調兵遣將加以討伐，仗打了一年多，相持不下。不久呂后死了，戰爭也就停止了。從三號漢墓同時出土的駐軍圖和大量兵器來看，墓主人利蒼之子很可能就是長沙國的一員負責將領，而這三幅地圖就是為應付這次戰爭而繪製的。駐軍圖繪的也是同一地區，但範圍較小；圖中繪有“周都尉軍”、“徐都尉軍”、“司馬得軍”等軍隊的分佈情況，以及居民戶數和村莊之間的距離等，或許就是漢代所稱的軍陣圖。

⑤ 古代巴比倫亦即Mesopotamia地方，曾發現四千多年前繪在土陶片（clay tablet）上的地圖，但只是一些簡陋的原始地圖，不可能和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地圖比擬。

少。

在這三幅珍貴的古地圖出土之前，我們所能見到的中國最早地圖，只有一一三七年刻石的《華夷圖》和《禹跡圖》（詳見第五節）；最早刊印的地圖，見於《十五國風地理圖說》，^⑥是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1155）的產品，距今皆不過八百多年，圖齡和漢墓出土的地圖相差一千三百多年！所以這些漢墓地圖的出土，真是中國地圖學史上的一大發現。此等優異古地圖的重現人世，還幫助解決了一些中國歷史地理的疑難，例如漢初長沙國的南部邊界以及觀陽縣的設置年代等。^⑦地形圖上的乾道縣，不見於漢以來任何記載，包括各種地方志；現在看到這幅地圖，才知道早在二千一百多年前，九疑山下曾設置過這個名稱古怪的縣。

⑥ 見楊甲所編《六經圖》，六卷，《宋史》二〇二《藝文志》一五五有著錄，北京圖書館有藏本。楊甲《六經圖》所附的地理圖，是目前已知全世界最早刊印的地圖，較Lucas Brandis在1475年於Lübeck出版*Rudimentum Novitiorum*所附地圖早三百多年，而其準確度也遠較後者為高。

⑦ 譚其驥《馬王堆漢墓出土地圖所說明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載《文物》1975年第6期。

二、古籍中關於地圖的記載

中國古籍中關於地圖的記載很多，有早達三千餘年以前的。例如《詩經·周頌》中的若干詩句，曾被解釋和地圖有關，⑧不過尚難加以肯定。但從稍後的其他文字記載中，仍可證明地圖在中國的出現極早。《尚書》中的《洛誥》，便記述了周朝初年，成王命周公旦卜建洛陽城。周公曾實地考察選擇，將占卜選擇城址的結果，繪成地圖，聯同占卜的經過情形，一併獻給成王。其原文的記載如下：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

⑧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第二十卷《周頌》記載：“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墜山喬嶽，允猶翕河。”何楷說：“墜山兩句，望秩以祀山川也。”孔穎達：“天子巡守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則知墜山喬岳，允猶翕河，皆謂秩祭之事。”《爾雅·釋言》：“猶圖也。”鄭玄的箋註解釋“猶”為地圖；他說“墜山喬嶽，允猶翕河”二句，便是按照地圖上所指示的山川，依次進行祭祀的意思。如果鄭玄的推想不錯，這可能便是中國現存的有關地圖的最早記錄。在古代社會中，祭祀是很重要的。

作《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伋來以圖及獻卜。”

此處所謂“伋來以圖”的圖，可以肯定的是地圖；並且是爲了選擇洛陽城址而特別繪製的地圖。

《周禮》和《管子》，大概都是戰國時代（公元前403—221年）的著作，其中也有一些關於地圖的記載。當時隨着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地理知識的積累已相當豐富，地圖的繪製和應用也日益增多。國家在行政統治上需要地圖，土地開拓和經濟建設，包括灌溉渠道和運河等的構築也都需要地圖；所以《周禮》作者敘述地官大司徒、小司徒之職，都涉及地圖。⑨而在戰爭用兵方面，更迫切需要地圖。

⑨ 《周禮·地官司徒》，有如下的一段記載：“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野。”這說明了大司徒的職責，主要是保管國家的土地之圖。據鄭玄解釋：“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這一段文字，不但提到地圖的用處以及它的內容，而且也證實了中國老

《孫子兵法》有附圖九卷，《孫臏兵法》中有附圖四卷，其中有一部分應當是地圖。

關於軍用地圖，《管子》卷十《地圖》篇，有如下的精彩描寫：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輿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莠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因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

《孫子兵法》的《地形篇》，也說：

早便設有保管地圖的專官。此種天下土地之圖，不僅有其地域的範圍，並且還表明了各項地形地物。原註中對於丘、陵、墳、衍的解釋是：“土高曰邱，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又云：“小司徒之職，……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

《周禮·天官冢宰》：“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三日聽閭里以版圖。”鄭司農云：“版，戶籍也；圖，地圖也。”《周禮·春官宗伯》：“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周禮·夏官司馬》：“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我們大致可以這樣說，中國古代地圖的製作和應用，最先盛行於戰國時代。

像《地圖》篇所說的地圖，已經是有系統的地理知識的具體表現。它對於地形地物的表示，已更加完備，內容也更加複雜。如果沒有豐富的地理知識，或者缺乏實地的調查，恐怕不易編製出這樣的地圖。換言之，由於征伐的實際需要，中國早在戰國時代，地圖的使用已經相當普遍，而且內容也頗爲充實。《戰國策》卷一九《趙策》四記蘇秦以合縱說趙王曰：“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不論此項比例正確與否，蘇秦總是看了地圖才作出這個估計的。

《史記》卷六〇《三王世家》，曾記載漢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御史奏輿地圖，封齊、燕、廣陵三王。“……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⑩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

⑩ 《漢書》卷一九《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有兩丞，秩千石。一日中丞，在殿中蘭台，掌圖籍祕書。”

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

我們雖然找不到關於漢代全國性地圖的詳細記錄，但從零星的記載中，覺得這種地圖是曾經存在過的。《漢書》卷六《武帝紀》註：“臣瓚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後漢書》卷二四《馬援傳》：“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晉書》卷三五《裴秀傳》也曾提到：“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再就班固《東都賦》“天子受四海之圖籍”一句推想，漢代可能已經有了由各郡國奏進地圖的制度。而漢武帝的軍事擴張政策，也必然促進了地圖的製作。事實上，兩漢共有四百多年，中央政府通令地方呈送地圖，以備編製帝國全圖，是可以想像的。何況漢代的工商業已頗發達，長安、洛陽、成都、邯鄲、臨淄、宛、陽翟等地都發展為工商業城市，各地的商品和特產運輸頻繁，地理知識已大為推廣。關於漢代的輿地圖，不但馬援、臣瓚和裴秀看見過，他如東晉虞喜的《志林》，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以及唐代徐堅等的《初學記》，也都曾提到。《史記》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傳》《索隱》引虞喜《志

林》說：“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古也。”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所指東漢張衡《地形圖》，則大概是繪畫局部地區山川城邑的山水畫式地圖，和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長沙國南部地圖相似，不可能在全國性的。①至於朝廷應用輿地圖以及個人繪畫地圖的事，《漢書》和《後漢書》都有不少記載：《漢書》卷四四《淮南王傳》：“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

《漢書》卷五四《李廣傳》載李陵：“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

《漢書》卷八一《匡衡傳》：“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代韋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鄉本田隄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閩

① 漢代大天文學家張衡（78—139），他對地理學和地圖學的貢獻，可能為天文學的輝煌成就所掩蓋，而未為人所注意。《後漢書》卷五九《張衡傳》：“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曆算。……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其中《算罔論》，說是“網絡天地而算之”，顯然和經緯度的概念有關。

佰爲界。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郡圖誤以閬佰爲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遂封眞平陵佰以爲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郡乃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佰爲界，不從故而以閬佰爲界，解何？’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儻，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

《漢書》卷九六中《王莽傳》：“……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中講禮大夫孔秉等與州郡衆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於壽成朱鳥堂。”

《後漢書》卷一六《鄧禹傳》：“光武舍城樓上，按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

《後漢書》卷十上《皇后紀》明德馬皇后：“十五年（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帝案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

《後漢書》卷八一《李恂傳》：“後拜侍御史，持節幽州，宣佈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

地圖關連軍事和國防，自古具有機密性，成爲搜集情報的主要對象。有作爲的政權或具雄心的人

物，莫不注意地圖，於是便產生了許多有關地圖的故事。例如荊軻刺秦王⑫和張松獻地圖⑬等等。中國古代的所謂“版圖”，便象徵着國土；其中所謂圖，應該便是國家的基本地圖。奉獻或進貢地圖，往往就表示歸附及投降。後漢時南匈奴密遣漢人郭衡奉獻地圖，翌年便請求歸附中國。唐代河西隴右一度被吐蕃侵佔，後到大中年間，沙州刺史張義潮遣其兄義澤以瓜、甘、伊、肅等十一州地圖來獻，就表示了失地的收復。⑭北宋天禧二年（1018），

⑫ 荊軻刺秦王的故事發生於戰國時代。荊軻原來是衛國人，後到燕國，鑑於燕國面臨強秦的威脅，情勢危急，於是挺身而出，想去刺殺秦王。他以奉獻督亢地圖爲名，要求晉見秦王，面遞該圖。也正因爲這幅地圖很難得和很有價值，秦王才親自接見荊軻，於是發生了有名的壯烈故事。

⑬ 張松獻地圖的事發生於東漢末年。當時劉備爲了想進佔四川，曾籠絡張松和法正二人，目的是想他們提供益州（四川）的情報。後來張松果然把益州的地理形勢和軍事情況，報告給劉備；並且將山川險要，繪成地圖，獻給劉備，於是劉備才得知益州的虛實。《三國志·先主傳》註引《吳書》的一段文字：“備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其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

富州刺史向通漢，以《五溪地理圖》來上，也是等於表示內附。

北宋沈括所著的《夢溪筆談》卷一三《權智》，有一條關於地圖的頗為有趣的記載：

熙寧（1068—77）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揚州，牒州取地圖，是時丞相陳秀公^⑮守揚，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仿其規模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⑯

《宋會要輯稿·兵》二八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知定州韓絳言：“北人郝景，過南界權場，闇畫地圖，已密遣人收捕。”

⑭ 關於這一方面的類似記載很多，《舊唐書》卷一三《德宗本紀》貞元十三年五月丙戌條：劍南節度使韋皋收復嶺州，繪畫地圖以獻。同書卷一四元和二年四月庚辰條：嶺南節度使趙昌進瓊、管、儋、振、萬、安六州六十二洞歸降圖。

⑮ 陳秀公係指陳升之（1011—1079），建陽人，景佑（1034—1037）進士，累官侍御史，知雜事。神宗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秀國公。

⑯ 張方平《樂全集》卷二七《請防禁高麗三節人事》條：“臣竊聞高麗國進奉使人下三節人，頗有契丹潛雜其間，經過州縣，任便出入街市買賣，公人百姓只應交通，殊無檢察，所至輒問城邑、山川、程途、地里、官員、戶口，至乃圖畫，標題意要，將還本國。自明州至京水路三千餘里，昨江浙饑疫，公私凋耗，國之虛實，豈宜使蕃夷細知？”

三、裴秀與製圖六體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爲了加強統治，發展驛道交通，中央政府曾集中了大量圖籍，然後爲蕭何所接收。^{①⑦}但到了晉朝，秦及其以前的地圖，似皆已失傳。只有漢朝以後的地圖，還有若干被保留下來。不過這些地圖，多數沒有統一的繪製原則和標準，很難求其準確可靠。《晉書》卷三五《裴秀傳》，曾引用其《禹貢地域圖》的序言：

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①⑧}惟有漢

①⑦ 《漢書》卷三九《蕭何傳》：“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嘗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疲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

①⑧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六國的圖籍被集中到京都咸陽。秦

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①⑨}雖有粗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

因此如何來綜合前人的經驗，使能提出一套共同的原理或規則，作爲地圖繪製的體裁，已成爲時代的客觀要求。晉司空^{②⑩}裴秀，終於發明了劃時代的製圖六體，成爲中國最早的地圖學典範。裴秀（223—271年）爲河東聞喜人，在晉代初年很有名望，並爲皇家所親信。他在三十四歲時，曾隨司馬

朝滅亡時，此等圖籍爲蕭何所接收，藏於石渠閣。《三輔黃圖》卷六：“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礪石爲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爲閣名。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東漢班固撰《漢書·地理志》，還引用到秦代的地圖。《漢書》卷二八《地理志》，代郡班氏下註：“秦地圖書班氏，莽曰班固”。琅邪郡長廣下註：“奚養澤在西，秦地圖曰劇清池，幽州薊，有鹽官。”可能東漢末年散失了，故在西晉初年，裴秀便說：“今祕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

①⑨ 裴秀這樣給漢代地圖所下的籠統評價，並不完全正確；本書第一節所述的馬王堆漢墓出土地圖，便是一個明顯的實例。裴秀當然沒有機會看到漢墓內的地圖，或許他所看見的都是些全國性比較簡略的地圖。

②⑩ 《尚書·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